

報 告 文 學

香 港 之 戰

華 君 著

文 林 出 版 社

報 告 文 學

香 港 之 戰

華 君 著

文 林 出 版 社

原
书
缺
页

把燈從柱子上除下，弄上一塊防空布罩，又扯了上去。這最多不過說明今晚也許會來一次緊急防空演習，至於真的空襲，很像太少可能了，一般人對這都似乎很有自信。

而事實上是，一般人的情想完全錯誤了，法西斯的魔手正是這時候伸進這過了一百年平靜生活的自由商埠來了。

當羅士打行三樓的遠東情報部正式公布了日本向英美宣戰的消息，馬路上立刻有了三三兩兩的人羣，站在路邊咬着耳朵說話。這可怕的消息便這樣馬上傳布開去，隨後幾家英文報紙都出版了號外，戰爭的火藥味立刻瀰漫了整個香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侵略便這樣殘忍地降臨在這可愛的都市來了。

我從告羅士打行出來，碰見了一個在新聞界工作的朋友，他告訴我：「剛才日本飛機炸啓德場和深水埗兵房，聽說宋皇台附近的民房也炸燬了不少。」從另一方面證實了這消息之後，我便立刻趕回寫字間來，看送來的路透社的電訊，知道日本在七日的清晨已經突襲珍珠港，太平洋的戰爭便是這樣突然的全面爆發。

這時候，我們的心情都很奇怪，既興奮也有點興奮，說不安也有點不安。事實上島形勢的轉變得太突然了，光靠那腦袋上的絨絨絨像已不能迅速地解這目前的情勢，雖然這原就是意料

中必會到來的一天。誰說這不使人家弄胡塗了呢？昨夜以前的一切計劃一切打算，到了今天都變成廢紙，戰爭完全改變了每一個人的思想和生活，這第一次殘厲地吼叫的空襲警報把整個香港都改變了，連樓拔起的改變了。

當一般居民知道了這是真正的戰爭時，他們是那樣惶惑。由於對戰爭的無知，他們有些簡直不知道怎樣去處理自己的生活才能適應這一次的戰爭。一向過着平靜的生活的香港人才戰爭如何能想像呢？因此，當下午第二次警報拉響的時候，市面上的慌亂情形，是很使人悲痛的。每一個人人都爲了逃避死亡而狼狽的奔忙着，有些走向防空洞，有些跑進比較堅固的建築物里去，有些往半山跑，有些却趕往海傍，最可憐的是那些沒有目的地在馬路上狂奔的人們，他們那種可憐翔實在太使人感動了。

在半山的一個回教堂那里，我看着日本飛機轟炸九龍。以前雖也看見過日本飛機在中國土地上的轟炸，但深深地感到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創子手的殘忍，這還是最難忍受的一次。試設想一下，在那樣密麻麻的房子里，每一幢房子的每一層樓，平均也住上個二三十人的民房，又怎麼經得起炸彈呢？在有些地方，一個炸彈只不過毀掉一幢房子，可是在香港，建築物之外，我們必須計算那上萬的生命。他們便是這樣無辜地犧牲在法西斯主義者的手里了。他們是無辜的，對日本

法西斯殺死他們，只留下要佔領一個無足輕重的城市。

日本在香港的空襲是非常狡猾的。它並不好像在中國內地一樣成羣結隊地飛翔，而是一架東一架西的，企圖避免在那麼一點小的天空上遭遇雷集的對空防衛射擊的炮火。英國沒有飛機參加空戰，制空權的落在法西斯的手上，同時也就是慘酷屠殺的開始，而災區里被害的平民，無論是不幸的中國人或是外國人，便這樣無辜地丟掉生命了。

看守教堂的那個回教印度人，他仁慈地接待着到來避難的鄰近居民，同時却用他那生硬的英語說一遍，再用更生硬的廣州話說一遍，翻來覆去的解釋這一次戰爭的殘酷性。從那些語言里表露了他對侵略者的憤恨，他說這世界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法西斯。當時很多避難者都被他懇切的談話感動了。最後他還數了一下避難者的人數，通知教堂的廚子，叫他準備這許多人的晚餐。

第二次警報解除後，市面立刻恢復了過來，而人們却在紛紛打聽戚友們的消息，以及佈置着搬家的事情。誰都意料着一次大的災劫將要到來，而儘可能的設法逃避。香港便在這忙亂和騷動中度過這戰爭的第一天。

雖然夜半給那一次誤會的夜襲驚醒過一次，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還是充滿着非常興奮的精神，迎接那和戰爭相配合的新的工作。

走到外面來，看見遍地的陽光，和聽着路邊樹上的平和的雀聲，真有點忘記便在這都市已爆發了戰爭。一個人的心情是很奇怪的，四隨着所處環境不同而有所變易。與是在尋常時候，這樣的一付好天氣，誰不是帶着一付輕快的心情工作呢？可是，今天，「太平洋上的一二·八」的後一天，走在這和尋常日子一樣的路上時，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那樣帶着一個鉛樣沉重的心情，到被響息了般的不安。

還不過是一天前的事。七日那天還是星期日，誰也一樣愉快地度過這愉快的安息日。那天中午，我還和幾個朋友跑到太平山頂去，環繞香港而走了一週。那是全香港最高的山峯，在那條人工開鑿的山路上，憑欄俯瞰港九兩地，我們還在那里說着玩。一個朋友說：「假如香港有一天發生戰爭，那會怎樣呢？這是一個難題目，我們都沒準備下結論，只有另一個朋友指着路邊的一個石岩改轉話題的說：『恐怕這是香港最安全的防空洞了。』這話立刻引起另一朋友的反駁，她說：『事實上是你沒跑到這最安全的防空洞里來的時候已經給炸死了。』這完全是可能的。但當時大家還不過是說着玩的，所以只聽一陣笑聲又把這可怕的黑影拋開了。

後來她對面來了一對小孩子，有一個坐在小車上，後面一個女用人在推，而另一個女孩子，約莫五六歲的，卻在一本正經的走着。看孩子們的樣子，都是富有的外國人的少爺小姐，而她們的天真無邪也實在引起我們貪玩的心。她們大概也是星期日放假，才到這山徑上來玩的，而她們這種舒適愉快的生活已不知給她們帶來了多少智慧，而這些智慧却仍不能為她們解除戰爭的災難，在她們天真無邪的童心里又怎麼會想到即在那時候，已經有着她們的敵人在她們的旁邊計劃着，如何地在最短期間內獲得這都市，而誰又想到，還不到二十天以後，這樣天真無邪的小孩子，會和她們的父母同樣，給人關在那臨時設在南屏酒店的一英米蘭僑民收容所——里，并且失去了自由呢？就算是我們吧，在那時候也還是沒有想到戰爭已逼近了的。雖然我們在當時還遙指着昂貴而寬大的宴會炮那太暴露目標了，而兩個朋友還在那里打賭，那墩設在崖邊的水雷封鎖線究竟能擋住還是水雷艇？

從山上下來時，我們邊走邊談着，是如何地滿意這一次旅行啊！我們還正在相約着，爲保證我們的健康，以後每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都必須有一次這樣的郊外旅行，以愉悅身心。最後還有一個朋友上餐館去，吃了一個「星期特別餐」，這在我們的生活里，已經是一次豪華的享受。可以說，在當時誰會想到這會，最後一次的旅行，和最後一次的愉快的星期晚餐呢？

其實，便在那一天，日軍的飛機已
也已驟然起來了。這真是使人難
厚道了，對待死忍原來便不能太仁慈的。這一次太平洋閃電戰的爆發，應該教訓了每一
人：和 西斯主義者講道德，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請看今日香港一百六十多萬僑民奔忙狼狽！馬路上都是毀家的車子，他們坐在車上，扭
齊一付心事，帶着替換的衣服，便跑到他心目中認為安全一點的地方去。有些從東區跑來中
區，有些從西區跑去東區，有些從山頂跑下來，有些跑上山山親戚家里去。而多半是只管一家人
跑在一起，他們的意思是死也得死在一塊。觸目驚心的景象，真使人看了心里難過。尤其是香港
政府宣布了住在九龍的不准過海，更引起一般人不安。許多人都從九龍那幾艘艇子到香港這邊來
，原因是新界那邊英日軍隊已開始接觸，而她們許多戚友家人都在海這一邊。在馬路上，看見藍
裝成羣結隊攜着行李包袱的人羣，更足以增加這都市的混亂情緒。

警報機像寒熱病患者，才響過空襲警報，又是解除；解除的還沒有拉立刻又轉着低沈音調
的空襲警報。日本飛機的根據地距離這里太近了，輪迴空襲的結果，使每一個市民都感到疲勞，
他們簡直不能做任何事情，有些懸在防空洞里不敢出來，有些却滿街的跑，不管什麼警報。事實

上是兩日來的經驗，已使每一個人感到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只隔一重薄紙。未了的事，還是趕快做，可以攔避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也得趕快做，而其他什麼也都不管了。

各家報館已能夠立刻適應戰時狀態，早出報，第一次版第二次版的接續紛紛出報，只恐有時跟消息，便立刻出號外。篇幅雖然縮小，但除了廣告這些報紙的附屬物，新聞價反而增加了。新聞記者在這時候也顯得特別活躍，有些英文報的記者而且到新界前線去採訪，從來聽說有一個英國記者在前線殉職，這倒是一件很可感動的新聞的新聞。可惜的是中國記者卻沒有這些便利，只爲了領一張「通過證」，也得在華人行那里交涉了幾天，而最後才算從那四位華人代表那里討准人情發給，到每一個人的證拿到手時，戰爭已差不多到最後階段了。如果說在這一戰戰爭有什麼事認爲是遺憾的話，那就是香港政府並沒有很放胆的信任中國人，在這一戰戰爭中盡他的本位工作。這是很值得惋惜的。譬如說，香港有一百六十多萬的中國僑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他們還有過半是生長在香港，生活在香港，和全部財產都在香港。他們不僅在反法西斯這一共同目標上支持香港政府作戰，而即便爲他們的生命財產計，他們也必盡全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可是，在這一戰戰爭中，他們都只能夠做一個逃難者，這是一件多可惜的事啊！

在當時的華文報紙上，大家都有着一致的樂觀論調。記得有一段港聞是記載着戰爭中的香港市容的，那是敘述着中國人到米店去購米時的那種整齊團結的姿態。在米店門口，順着次序，兩人一排，或三人一隊的，輪着排隊站下去，人雖然多至二三百，隊伍或者延長至百餘間店舖的位置，但大家都很守秩序，一個輪着一個的，依次購買。當時大家都說：「這一種精神就是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保證。」這是事實。在戰爭開始兩三天時的每一個中國僑胞都有着這麼一個同仇敵愾的心理：支持香港政府，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香港最大的問題是糧食問題。本來在戰前香港政府已囤好八十萬包米，約莫可以供給全香港居民八個月之用，原來是不成問題的。可是，在戰爭開始以後，運輸增加困難，而一般人手頭稍有些錢都準備多買一點，這樣一來可爲難了那些吃一頓買一頓的貧民，他們常常買不到米，或者簡直無法買米。這樣一來，可相當的影響了市面的治安。當然，這一種不安在這時候還并不很嚴重的，最多不過在路上也常發現了那些餓死的屍骸罷了。至於在淪陷以後，這種現象發展成爲「大魚吃小魚」的搶匪世界，那却是以後的事。

在當時，報上的消息都是非常樂觀的。從八日到十日，一般人都很興奮。尤其談到好些報紙的特訊，說中國軍已迅速南下援助香港，一路已逼近淡水，一路又深入廣州，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誰不替中國軍打通了廣九路，回到廣州市去過年呢？

我那可憐的姊姊，有一天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她只問了我一句：「最近的消息好不好呀？」政府命令是禁止在電話中談戰局，我當然不能犯禁，所以只能騙騙的高興說都是好消息，她聽了高興得很，連聲的說：「是好消息就好了！」最後還叫我那三歲的小外甥在電話里給我問好。那時候我的心真難過極了。本來我想叫她們一家大小從九龍過海來再說，因為當天我已聽到要放棄九龍的消息，而香港九龍兩地的大部份存糧都在香港這一邊，失陷後的九龍那種恐怖情形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但是，爲了大局，我還是放下了電話筒，而以後她一家大小的消息也就沒有了。在以後的日子里，直到現在，我的耳邊還響着那小外甥的天真的叫聲，而她們如今的生死存亡却是無法探悉的。在香港，爲這一次戰爭而離散的人們真不知多少，我原算不得什麼，但這一筆債却總不能無代價地塗去的。

在這一段日子里，我都是在香港大酒店那里和一班朋友一同渡過的。有一次，剛巧是敵人的大炮向這些大建築物猛烈射擊的時候，大家都沉着氣在那里工作着，或是走着。在一個角落裏

却坐着一個已經白髮了的外國老婦人，她沉默地打着絨線衫，已經快要打好了。外面的炮聲，爆炸聲，和玻璃破碎聲，對她很像一點威脅也沒有，只在那裏一針緊似一針的打着。後來從我們面前匆忙的走過一隊外國兵，他們推糾糾的走過，手里都拿了槍，是要出動的樣子。有一個約莫二十歲的青年，走到老婦人面前，在她額上輕吻了一下，正想離去的時候，老婦人却把他叫了回來，替他穿上了那件剛打好的絨線衫，推了他一下，只說一句：「Good Bye and Good Luck!」那青年軍人笑了一笑，也就走了。也許那青年軍人去了再不回來，而他的去是愉快的，因為他有那樣一個慈愛的母親。以後我每一次到大酒店里來尋看見她，仍坐在那角落里，手里不打絨線，却戴上老花眼鏡在看報了。她一定是非常希望讀勝利的消息。二十日以後我再也沒有上大酒店去了，後來要是她知道她自己已變成了俘虜，而又不和她那個年青的孩子在一起的時候，她多傷心啊！而且日本人對這些俘虜非常虐待，不知道她有沒有因為受不住侮辱而犧牲了呢？

四

為了工作便利起見，我們從荷里活道搬到大道中來。當天我在路上遇見一大羣從對海邊過來的人，他們有些揹着自己的行李，有些還拖着小孩子，看他們的狼狽樣子心里真有點難過。昨

天有一隊朋友過來，還在對海碼頭那里演了一次悲劇，因為有些流氓硬要搶他們的行李給他們回來，結果有兩位朋友便給那些流氓用小刀刺傷了。這一次我碰到了還另一批過海來的朋友，高興得很連忙趕過去招呼他們，把他們都帶到大道中那新房子里去，然後我才回到結志街里來。剛踏進門，又是一種觸目傷心的零亂情形，這是一批朋友擠在這里，他們把行李堆得橫七豎八的，人那憔悴不堪，看那種亂雜的局面真使人心難過。

開始這幾天消息都很好，戰局是將穩定下來的，大家也很樂觀。有些朋友還打算把刊物改做戰時刊，有些朋友則準備演一次更有意義的戲，每一個人都很興奮，其實就全個香港的一百六十多萬中國僑胞，除了少數忘記走卒和另一些啞食樂禍的寄生蟲，誰又不為這劃時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興奮呢！當天我就把這種樂觀與興奮的情緒寫了出來，發表在報上，題目叫做「香港真發起來了！」

這幾天我都盡自己一切力量去奔跑，有一天稿也已經發齊，印刷所亦把版子做好了。我却因為得到了一個非常興奮的新聞，立刻打電話去叫他們到排字房去加一條最後消息，我要求把道滯島用三號字排印，那就是：「中國軍隊克復深圳。」當天的晚報每一份都有這消息，而每一個居民都為這好消息而鼓舞。在那時候，誰不在這樣盼望呢，要是中國軍隊真能加派精銳部隊迅速南

下，是不僅可以援救九龍之危，即使克復廣州也決不是個夢想而已。可惜的是，香港一百六十多萬居民天天把眼望穿了，祖國的戰士還是距離得那樣遙遠啊！

晚上，我回到宿舍來，那里已改了一個樣兒。三樓是全部讓出來給從對海逃過來的朋友，大夥兒打地舖就睡幾天再算；他們還有一些睡不下的，便跟中央戲院的老板商量，讓他們到戲院子里去睡。二樓也就變成了同時是辦公室同時也就是宿舍，辦公桌白天里可以辦公，晚上却同樣的可以當床上睡。大家雖然睡得很不舒服，但心里還是一樣痛快。

在戰爭以後，任何一個人的工作也都加緊起來，個人的私事差不多都減到零度，而即使把全付精力全付時間支配到工作上來，有時真是還恐不夠的。每天在華人行那里，經常都有全港的新聞記者的集會，在座的有四位華人代表，和政府的華民政務司。他們規定每天接見新聞記者，爲的是想將政府的意旨藉新聞記者的報導傳達給一般居民，同時也爲了幫忙全港的華文報紙解決他們業務上的困難，爲了保證每一份報紙都能在戰時繼續照常的出版。那時候對新聞記者發言最多的那位華人代表，同時也是香港太平紳士的羅旭和爵士。他講的話常常是瑣碎雜亂，使人很難執筆。還偏仗在後來香港已給日本軍隊佔領的時候，他又給酒井中將請了出來在與亞機爾做事，在他自己，還是一個「華人代表」，在半島酒店的招待席上也發表了同樣瑣碎雜亂的談話，可是談

話的內容已不是要求華人支持香港政府抵抗到底，而是大亞細亞主義和大東亞和平共存共榮了。同一個人的同一個嘴吧，在不同的時候也會說出完全相反的話來的，這真使人感慨。

這時候，香港政府爲緊急處置，做了三件非常痛快的事。首先是釋放中國五百孤軍，因爲中英兩國已比肩作戰，中國的戰士同時也就是英國的戰士，現在他們都已參加保衛香港的戰鬥。第二件是封閉日本人辦的「香港日報」和汪詛走卒辦的「南華」，「天演」，「自由」，三家老牌漢奸報，姑息了三年的不利於中國抗戰的宣傳機關是這樣一網打盡了。最後，港府還拘捕了那密謀不軌的陳廉伯，這墮落的買辦，廣州商團事變失敗了便到香港來做寓公，同時也幹無恥的勾當，今日的被捕，其實也是給中國人除去一重恥辱。

五

九龍是十二月十二日失守的。

那一天，猛烈的砲聲到了中午以後忽然沉寂了。這沉寂是非常奇怪的。我們很驚訝的聚集在香港大酒店的大客廳那里等候消息，一般的推測都以為這並不是一種吉利的預兆。後來，我想到軍事情報部聽消息，便趕忙穿過大堂廳，從橫門走出去，那是一條通到告羅士打行去的大角道，

在尋常日子裏這是很高貴的地方，現在却自然而然的變成了避難所。很多附近的居民都帶了槍械，蹲在地上，一家大小的擁在一起，蜷縮着在發抖。他們是把自己的生命寄託在這大建築物的水門打和鋼筋上了。我穿過這條角道，幾乎費去了二十分鐘，因為避難者實在太多，擠得簡直沒有辦法可以讓出一條路來。

電梯在警備期間是停止上落的，我只好從樓梯那里走上去。在剛來到憲實情報部的門口的時候，却碰巧碰到一個熟人，他帶着一付緊張的神情，非常神經質的朝我望了一眼，搖了搖頭，避一句話也沒有說的便走掉了。我很奇怪，且已預感到必是有了不吉的新聞，於是趕忙着三步并作一步的走進了寫字間。那里面情形很荒涼，一大堆文件打了包裝進了籃裏面去，職員們已不能安靜地坐在寫字桌上安閑地工作，都是那樣，很壞心情很不好的走來走去，忙着收拾東西。我沒有打擾他們，習慣地取了一張下午二時三十分發表的第二次公報，便轉身走了出來。

鄰近樓梯拐彎的地方，透在窗前的亮光，我讀了這一次失利的戰報。那上面簡單地寫着：「敵軍已於今日正午十二時自九龍撤退，這是必需的措置，以後即進入保衛香港的正規戰爭。這則公報把我弄糊塗了。我立刻迅速的跑了下來，在大餐廳那邊抓住了一個朋友，他是懂英文翻譯的，我請求他立刻給我解讀這個公報，因為我從來都不信任自己的英文程度的。那時候我多希望他能